

• 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

程序公正与权威信任：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机制*

吴玄娜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 北京市学习与认知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37)

摘要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时期, 社会风险加剧。其中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群体性事件频发。事件的背后, 反映出民众对公共政策的不认可, 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能充分考虑民众的接受性, 极有可能构成新的社会风险, 威胁社会稳定。因此, 如何有效地提高民众对公共政策的接受性已经成为我国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项目欲建立程序公正、结果宜人性和权威信任(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模型, 从而有效提升政策可接受性。拟在不同的公共政策情境中通过 Scenario、实验室模拟实验和问卷调查, 探明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对政策可接受性、政府满意度的交互作用机制, 以及权威信任对此交互作用机制的边界效应,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对于政策可接受性、政府满意度及其因子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成果可用于提高民众对政策的满意度, 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程序公正; 权威信任; 认知信任; 情感信任; 公共政策可接受性

分类号 B849: C91

1 背景及意义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时期, 同时也是各种矛盾突发时期。全球风险和转型风险的双重叠加使之面临的风险愈发纷繁复杂, 其中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群体性事件频发。四川什邡官民对峙事件、甘肃陇南群众暴动事件、乌坎冲击政府事件、贵阳暴力拆迁事件……这一系列让人无法喘息的事件, 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陈天柱, 2011; 马浩国, 秦晓增, 杨其连, 2012)。反思这些事件的背后, 表面上群体性事件是民众抱怨社会治安差, 官民、警民关系紧张等具体问题; 实则反映了民众对当地政府权威并不认可, 暴露出政府决策透明性差, 公民不能有效参与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单光鼐, 2010)。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没有充分考虑民众的可接受性, 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风险因素(王二平, 2006)。在当今高风险社会, 政策的可接受性已经成为评价政策好坏

的重要标准(司马媛, 童星, 2011; 童星, 2010)。因此, 如何有效地提高民众对公共政策的接受程度以及对政府的满意度已经成为我国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研究将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探讨其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及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以往关于程序公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管理领域, 很少有研究将其拓展到公共管理领域, 尤其是公共政策领域。事实上, 程序公正不仅可以影响微观层面还可以影响宏观层面, 因为某些程序主要影响的是一个群体甚至整个社会而不是某几个人, 例如: 公正的程序可以影响人们对公共政策的评价(Tyler, Boeckmann, Smith, & Huo, 1997)。相关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公正的, 人们会更接受该政策(Leung, Tong, & Lind, 2007), 会更信任政府(Ulbig, 2008), 对政府的评价会更高(Leung et al., 2007)。虽然以往的研究证实程序公正正在公共政策领域的积极作用, 但是往往存在于西方文化背景下, 中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相对缺乏。其次, 研究范式一般采用相关性研究, 而对民众态度和行为等心理微观层面以及程序公正的内部机制缺少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探讨。而且, 因

收稿日期: 2015-12-25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01113)。

通讯作者: 吴玄娜, E-mail: wuxn@cnu.edu.cn

变量主要是态度或行为意向变量,缺乏行为变量的探讨。态度和行为有时未必总是高相关,有时态度对行为的预测力比想象的要弱(Patchen, 1983),因此加入行为变量的探讨无疑会使结论更加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以往无论是组织研究还是公共管理研究中均发现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对态度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而且交互作用模式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但是为何会出现两种不同的交互模式,目前尚未探究清楚。本研究首次在公共政策领域探究了权威信任在其中的边界作用,并进一步分析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对两种交互模式的调节作用机制。本研究不但可以进一步扩充现有变量主效应的研究结果,也可以和组织领域中的研究结论进行跨领域比较、和西方背景下的研究结论进行跨文化比较,进一步丰富程序公正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探究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交互作用的发生机制提供依据。实践上,也为政府提高民众对政策的满意度和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2.1 公共政策相关研究

有关公共政策的研究早已受到众多学科的关注。相比而言,心理学对公共政策的研究相对较晚。由于存在学科视角的差异,不同学者对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本研究采用 Easton 的界定,即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Easton, 1965)。这种界定更能够凸显心理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的联系,以及在制定和推行公共政策中的心理问题。

至今为止,心理学在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主要是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及时发现待解决的公共问题,了解民众对现行政策的评价以及政策的实施效果(e.g., Staples, 1997; 王二平, 2006),为制定相关公共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然而,已有的研究很少注意到政策制定程序与政策可接受性的关系。

公共管理学家非常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如,童星, 2010; 张玉, 唐良凤, 2012; 邹谢华, 朱明, 2009; 朱水成, 2008),但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政策内容等宏观层面,方法论主要以思辨为主,对民众态度和行为等心理微观层面仍缺乏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尽管如此,我们从这些研究中仍可得到启示。

首先,研究者们认为在当今高风险的社会,政策可接受性已经成为评价政策好坏的重要标准(童星, 2010)。如果说以前的评价标准是成本-收益之比,现在及以后将是收益-风险之比。日益增加的现实风险增强了人们对风险的感知。根据风险认知的测量模型,人们对于风险的态度并不取决于风险的实际灾害程度,而取决于危害程度是否被接受。因此对于公共政策,人们完全有可能因为不接受风险而拒绝接受该政策,如果拒绝的人多了,该政策就有可能被废除。因此,在当今社会,可接受性作为评价公共政策的重要标准显得尤为重要。这为我们选题的科学性奠定了基础。本研究将公共政策可接受性(acceptance of public policy)界定为民众对公共政策的主观评价和认可程度(以下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均简称政策可接受性)。

其次,对于政策可接受性的内部机制,研究指出程序公正、结果宜人性和权威信任是影响政策可接受性的重要前因变量(如,胡晓敏, 2010; 李大治, 王二平, 2007; 宁国良, 罗立, 2012; 韦春艳, 漆国生, 2010; 张玉, 唐良凤, 2012; 周柏春, 2009)。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定性的分析,究竟这些变量是如何影响政策可接受性,内部机制是怎样的却缺乏进一步的实证探讨。

本研究将从程序公正(procedural justice)和结果宜人性(outcome favorability)的角度探讨二者对政策可接受性、政府满意度的交互作用机制,以及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对此交互作用机制的边界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知信任(cognitive trust)和情感信任(affective trust)对于政策可接受性、政府满意度及其因子关系的调节作用。

2.2 程序公正对态度行为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程序公正的研究最早起源于法律诉讼,指的是冲突解决过程的公正性。本研究旨在探讨公共管理领域中程序公正对政策可接受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将程序公正进行以下工作定义:程序公正是指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公正性。

公正的程序对态度和行为有着积极的影响,公正的程序能提高人们对程序对结果的评价以及对程序规则的遵守,即存在“公正过程效应”(fair process effect)。程序公正有利于人们产生积极的态度和行为的结论已经在组织管理领域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e.g., Colquitt, 2001; Folger, 1977; Thibault

& Walker, 1975)。但是有些程序影响到的是一群人而不仅仅是某个个体, 因此程序公正还应该包含宏观的层面(Tyler et al., 1997), 例如公共政策的制定。因此程序公正也得到了公共管理领域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验证了程序公正对公共政策领域的积极作用。他们发现如果政策的制定过程越公正,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越强, 对政策的接受性越强, 对政府的满意度也越高(e.g., 李大治, 王二平, 2007; Leung et al., 2007; Ulbig, 2008)。

2.3 程序公正与结果宜人性

随着程序公正的积极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 人们开始探讨其调节因素。其中, 结果宜人性受到研究者普遍关注。结果宜人性(outcome favorability)指的是人们对自己在社会活动中获益多少的感知(Blau, 1964)。研究表明, 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存在显著地交互作用(e.g., De Cremer & van Knippenberg, 2003; Magner, Rahman, & Welker, 1996; Rolland & Steiner, 2007; Wu & Wang, 2013), 当结果对人们不利的时候, 程序公正效应更加显著; 当结果对人们有利的时候, 程序公正效应很小或者不存在(Brockner & Wiesenfeld, 1996)。换句话说程序公正缓解了不利结果带来的消极影响, 只有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都低的条件下才会引发人们非常消极的反应。因此, 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的交互作用又叫做“程序公正的补偿性效应”(Kwong & Leung, 2002)。

程序公正的补偿性效应得到了广泛的验证和支持(e.g., De Cremer & van Knippenberg, 2003), 但是研究者发现有时候程序公正正在面对不利结果产生的负面反应时并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甚至出现与 Brockner 和 Wiesenfeld (1996)的研究成果相反的结论。虽然之前人们公认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都低的条件下会引发人们的非常消极的反应, 但是近来的研究发现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都高的条件下会引发人们非常积极的反应(Chen, Brockner, & Greenberg, 2003; Lin, Che, & Leung, 2009; Wu, Wang, Xu, & Zhou, 2009), 换句话说, 程序公正不能缓解不利结果带来的消极影响, 只能进一步提升有利结果带来的正面影响, 即所谓的反程序公正补偿性效应。因此程序公正的补偿性效应是存在边界条件的。于是非常需要探明何时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交互作用显著, 如果显著, 二者的交互机制有何不同。

以往试图分析程序公正导致积极还是消极反应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结果变量的性质。当结果变量是组织的决策、领导者或支持者时, 程序公正导致积极反应, 即存在程序公正的补偿性效应; 当结果变量是个体的自我评价, 如自尊、自信等时, 程序公正导致消极反应, 存在反程序公正补偿性效应(Brockner, De Cremer, Fishman, & Spiegel, 2008)。最近的研究表明, 程序公平的补偿性效应除了受上述因变量影响之外, 还会受到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的影响, 例如东西方文化背景(e.g., Brockner, Chen, Mannix, Leung, & Skarlicki, 2000), 关系的重要性(Kwong & Leung, 2002), 个人是否是依赖型特质(Brockner, De Cremer, van den Bos, & Chen, 2005), 调节定向倾向(Cropanzano, Paddock, Rupp, Bagger, & Baldwin, 2008), 个人在组织中地位的不确定性(De Cremer et al., 2010)都会影响程序公正的补偿性效应。

2.4 权威信任对态度行为的影响

在态度和行为的研究中, 除了程序公正, 有关信任的研究引起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关注(e.g., De Cremer & Tyler, 2007; van Dijke & Verboon, 2010)。信任是一种复杂和多维度的心理状态 (McAllister, 1995; Lewis & Weigert, 1985), 是人们对置身其中的社会系统以及社会关系的一种普遍态度或期望(Luhmann, 2000)。Rousseau, Sitkin, Burt 和 Camerer (1998)综合了各个学科的特征, 将信任定义为: 基于对另一方意愿或行为的积极预期而愿意接受自己处于不设防易受害境地(vulnerability)的心理状态。Dirks 和 Ferrin (2002)通过元分析发现信任可以分为两个维度, 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认知信任建立在对他人能力、可预测性、可靠性的评价之上(Mayer, Davis, & Schoorman, 1995); 情感信任源于人们对另一方的情感连结(McAllister, 1995)。

权威信任产生于具有层级关系的群体中, 包括家庭、工作组织, 以及由法律和政治权威统治的国家(Tyler & Degoe, 1995)。权威信任的对象可以是家庭权威、组织权威、政治体制, 也可以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甚至可以是具体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或某一个政治领导人等(Citrin & Muste, 1999; Sigelman, Sigelman, & Walkosz, 1992)。由于本研究旨在探讨权威信任对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的影响, 因此权威信任的对象应为政

府机构。以往研究者发现,决定民众具体态度和行为的是他们对基层具体政府机构的信任,而不是对宽泛的“政府”或“政府官员”的信任(Goldsteen, Goldsteen, & Schorr, 1992; Levi & Stoker, 2000)。为了提高研究效度,本研究将权威信任进行以下工作定义:基于对基层政府意愿或行为的积极预期而愿意接受自己处于不设防易受害境地(vulnerability)的心理状态。对权威的认知信任(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对权威的认知信任均简称为认知信任)指的是:民众多大程度上相信基层政府有能力且可以依靠。对权威的情感信任(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对权威的情感信任均简称为情感信任)指的是:民众多大程度上相信基层政府关心他们的利益并且在行为上也以他们的利益为出发点。

权威信任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有着积极的影响。有研究发现权威信任会影响民众对于政治权力如何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配的态度(Hetherington & Nugent, 2001)、民众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度(Chanley, Rudolph, & Rahn, 2000; Hetherington, 2005; Rudolph & Evans, 2005),缴税和选举行为等(Hetherington, 1999; Scholz & Lubell, 1998);在组织管理领域,研究发现员工对组织权威(组织管理层)的信任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也有积极的影响(于海波, 方俐洛, 凌文轻, 郑晓明, 2007; Mayer et al., 1995; Kramer, 1999)。De Cremer 和 Tyler (2007)进一步通过实验室操纵权威信任和问卷调查的方法,探明了权威信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有关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也同样支持了对组织的信任(trust in organization)或对领导的信任(trust in supervisor)与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承诺的关系(许多, 张小林, 2007; 周明建, 宝贡敏, 2005)。组织可以看作复杂社会系统的微缩模型,组织领域有关组织权威信任的研究结果也可以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和公共管理情境。

目前关于权威信任和程序公正关系的研究非常丰富。研究初期,研究者认为程序公正和权威信任互为因果(Brockner & Siegel, 1996; Tyler & Degoe, 1995);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一部分研究发现程序公正通过权威信任的中介作用对态度行为变量发生作用(e.g., Brashear, Manolis, & Brooks, 2005);另一部分研究发现权威信任可以调节目程序公正对态度行为的影响(e.g., Lewicki, Wiethoff, & Tomlinson, 2005)。

权威信任对民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已经得到了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国内与权威信任相关的研究多关注组织情境,涉及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见,而且,有关公共管理领域中权威信任的研究往往仅停留于理论论述,实证研究,尤其是实验室研究非常缺乏。

3 问题提出

在分析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看出,程序公正、结果宜人性和权威信任对人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存在积极的影响,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有关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和态度行为的交互作用主要集中在组织管理领域,很少有研究将其拓展到公共管理领域,尤其是公共政策领域。而且,此交互作用研究结论往往存在于西方文化背景下,中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相对缺乏。探讨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不但可以进一步扩充现有变量主效应的研究结果,也可以和组织领域中的研究结论进行跨领域比较、和西方背景下的研究结论进行跨文化比较,进一步丰富程序公正的研究结论。

其次,以往关于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和态度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而且交互作用模式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即低低交互(当结果对人们不利的时候,程序公正效应更加显著;当结果对人们有利的时候,程序公正效应很小或者不存在。换句话说程序公正缓解了不利结果带来的消极影响,只有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和都低的条件下才会引发人们非常消极的反应,即所谓的程序公正补偿性效应)和高高交互(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和都高的条件下会引发人们非常积极的反应,换句话说,程序公正不能缓解不利结果带来的消极影响,只能进一步提升有利结果带来的正面影响,即所谓的反程序公正补偿性效应)。但是为何会出现两种不同的交互模式,目前尚未探究清楚。虽然有研究表明下属的特质以及权威和下属的关系会影响程序公正-结果宜人性的交互作用。但是少有人关注感知到的权威特质对程序公正-结果宜人性和交互作用的影响。权威信任作为感知到的权威特质,已经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但是以往关于权威信任和程序公正的研究只停留在二阶交互作用层面上,权威信任

是否是程序公正-结果宜人性交互作用的边界条件却至今无人探索。本研究首次在公共政策领域探究了权威信任在其中的边界作用,并进一步分析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对两种交互模式的调节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探究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交互作用的发生机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最后,公共管理领域中程序公正的研究范式一般采用相关性研究,缺乏实验室实证研究。而且,因变量主要是态度或行为意向变量,虽然这样容易与之前的研究进行对比,但是加入行为变量的探讨无疑会使结论更加令人信服。关于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态度是否能很好的预测行为,研究并未获得一致的结论。部分研究表明态度与行为具有较高相关(Press, Burt, & Barling, 1979),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态度对行为的预测力较弱(Patchen, 1983)。因此,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程序公正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也有待进一步探究。

根据上述有关程序公正、结果宜人性和权威信任对人们态度和行为的研究现状以及局限性分析,本研究将在不同的公共政策情境中探讨以下两个科学问题:

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如何影响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

何时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会影响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权威信任是否是其边界条件?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的边界作用是否相同?

4 研究构想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关于程序公正与权威信任影响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的研究

构想(见图1)

针对以上提出的两个研究问题,本研究可分为有联系的两部分。研究间的框架如图2所示。

4.1 第一部分: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影响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的作用机制

群体价值理论(Lind & Tyler, 1988)认为人们关注自己与他人、群体、组织之间的长期关系;他们把程序公正判断与是否被群体承认、尊重、是否属于群体的一份子联系起来(Lind & Earley, 1992)。当人们认为程序公正时,他们感知到自己有价值,受到尊重。因为程序相对比较稳定,人们感知到将来自己也会被人 and 群体尊重、认同,因此对现在的结果关注较少,即使现在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也不太在意(Brockner & Wiesenfeld, 1996);相反,当人们认为程序不公正时,他们更加关注结果对其是否有利。因此,第一部分研究假设如图1中假设模型1所示。

H1: 程序公正对政策可接受性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H2: 结果宜人性对政策可接受性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H3: 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对政策可接受性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当公共政策的结果不利于民众和有利于民众相比较,程序公正对政策可接受性的影响更大。

H4: 程序公正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作用。

H5: 结果宜人性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作用。

H6: 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对政府满意度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当公共政策的结果不利于民众和有利于民众相比较,程序公正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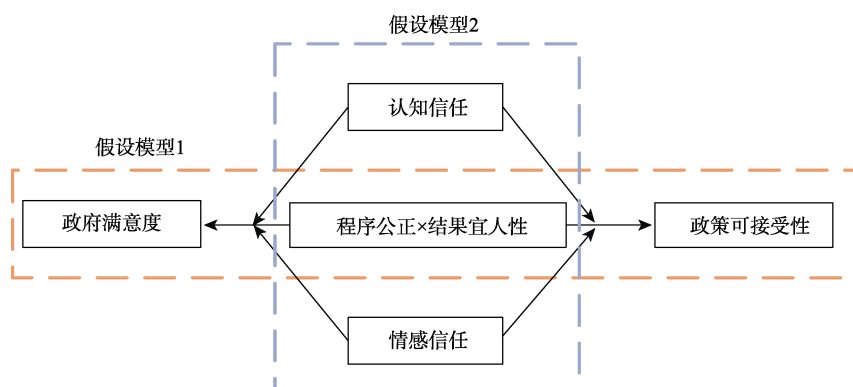


图1 变量间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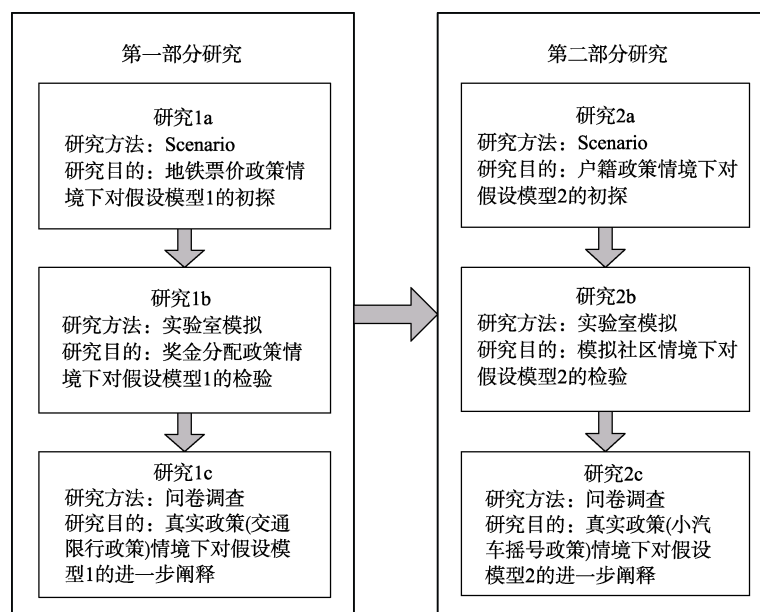


图 2 研究框架图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第一部分分为3个子研究(研究1a,研究1b,研究1c)进行。这3个研究分别通过实验室Scenario、实验室模拟实验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在不同的政策(地铁票价政策、奖金分配政策、交通限行政策)情境下,考察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对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的交互作用。这3个子研究对于程序公正的操作方法和测量方法是不同的。研究1a通过实验室Scenario的方法,在地铁票价政策情境下,利用“话语权”对程序公正进行操纵,探讨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对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的交互作用。研究1b通过实验室模拟实验的方法,模拟真实的奖金分配政策制定过程,实验之前招募被试120名,被试组成5人组成一组,分别进入单独的房间,每个房间有一台电脑,5台电脑通过网络相互连接的。整个实验过程都是在电脑上进行。首先,电脑从(A、B、C、D、E)中随机分配给每个被试一个不同的字母编号(事实上每个被试获得的编号都是D,但是被试并不知道,他们认为5个成员分别是不同的编号)。然后,被试被告知他们将组成5人小组,在电脑上完成一系列任务(包括5轮练习任务和1轮正式任务)。这5台电脑通过网络相互连接。整个任务结束后每个人可能会有50元的奖金。每个人最终能否拿到50元奖金完全由奖金分配政策决定。练习任务之前,计算机机会随机从5

个人中指定1名组长。组长将会根据组员练习阶段的表现,在正式的任务进行之前制定奖金分配政策。接下来,电脑随机确定组长的编号。事实上,组长的编号始终为A,5个被试都是组员身份。在指定组长后,开始练习任务,之后组长公布奖金分配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公布最后的奖金分配政策,小组成员进入正式的任务完全阶段,待任务完成之后把成绩反馈给组员。

关于自变量程序公正的操纵,利用“准确性原则”进行。任务介绍中提到在练习任务完成之后,组长将会根据组员练习阶段的表现,在正式的任务进行之前制定奖金分配政策并公布制定的过程。当所有组员完成5轮练习任务之后,组长通过网络告知奖金分配政策的制定过程。高程序公正组的被试被告知奖金分配政策完全建立在准确的信息之上,它是根据所有组员5轮练习任务的平均成绩而制定。而低程序公正组的被试被告知奖金分配政策只是根据所有组员第1轮练习任务的平均成绩而制定,没有考虑其他4轮任务的成绩。而结果宜人性是通过被试最后是否得到50元的奖金来操纵的。在该研究中还加入了行为的分析,通过收集被试对政策的支持行为,进一步分析态度影响模型和行为影响模型之间的差异。

研究1c以一个真实的政策(2009年4月13日,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后,北京市政府出台了“车辆

继续限行”的政策:北京市除特殊公务车外,各级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务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北京市市民对该政策看法不一,有的非常支持该政策的颁布,有的则对此非常不接受)为背景,进一步验证实验1a和实验1b的研究结论和生态效度。调查中测量以下变量:程序公正(采取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相结合的方式)、结果宜人性、政策可接受性、地方政府满意度;控制变量包括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了解程度、对公共政策带来影响的了解程度、对环境的关注程度、人口学等变量。

为了更好的验证变量间因果关系,研究1a和1b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对与研究1b中行为层面的数据采用卡方检验。研究1c由于是测量数据,采用了分层回归的统计方法。

4.2 第二部分:程序公正与结果宜人性到公共政策可接受性的调节模型——权威信任(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的边界作用

第二部分探讨权威信任是否是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影响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的边界条件,并进一步分析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的边界作用是否相同。分别考察在认知信任高低和情感信任高低的条件下,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影响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的作用机制。

下面作者将用公平启发理论和社会判断理论来具体说明权威信任对程序公正/结果宜人性的调节作用。首先,公平启发理论认为人们本来是想要接受服从权威的决策的,但是往往又担心自己会被剥削和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首先会进入“判断”阶段,判断权威是否可信,如果权威做出了公正或者有利的决策,人们往往认为该权威是可以被信任的(Kramer & Tyler, 1996)。接下来,人们会利用先前形成的判断指导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即进入“使用”阶段。如果人们面对公正的决策和对待,那么这些信息将被同化到先前的判断中,即权威是可信任的,例如:如果当事人认为法官是公正可信的,那么接下来的庭审中会对法官更加信赖;但是当人们面对的现实和先前的判断完全冲突时,将无法被同化到先前的认知中,这个时候与先前判断冲突的现实就会促使人们又重新返回到“判断”阶段(Lind, 2001),进而改变原来与公正相关的判断和认知。Lind(2001)还提出如果现实与之前的认知判断只是有一些不一致,只要

不完全冲突,都是可以被忽略的,同样可以被先前的判断所同化。因此,当人们信任权威时,只要结果有利或者程序公正都会被同化到信任的判断中,从而对权威的决策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是当结果不利且程序不公正时就会出现冲突,这个时候人们对权威做出的决策更多地会表现出消极的态度;相反,当人们不信任权威时,只要结果不利或者程序不公正就会发生同化过程,只有当结果有利和程序公正同时出现才会出现冲突,此时人们会表现与之前不信任的判断相反的态度,即积极的态度。

另外,社会判断理论(Sherif & Hovland, 1961)也指出人们对权威决策做出怎样的反应往往取决于先前的预期,如果人们先前对权威的预期比较积极,那么往往也会对其做出的决策表示满意和接受,即后来相关的信息会被先前的预期所同化;但是当现实与先前的预期不一致时,就会发生冲突,人们最终的态度将会受到现实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权威信任本质上隐含了人们对权威如何对待他们的一种预期(Mayer et al., 1995),这种预期不仅包含权威决策是否给他们有利的结果,还包含权威做决策的过程是否公正。因此,当现实中结果和程序都与信任的预期相冲突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态度;反之,最终的态度与先前的预期一致。因此,第二部分研究假设如图1中假设模型2所示。

H1a: 认知信任是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影响政策可接受性的调节变量。在高信任情况下,当结果宜人性低时,程序公正对政策可接受性有积极的影响,当结果宜人性高时,程序公正不影响政策可接受性;在低信任情况下,当结果宜人性高时,程序公正对政策可接受性有积极的影响,而结果宜人性低时,程序公正不影响政策可接受性。

H1b: 情感信任是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影响政策可接受性的调节变量。在高信任情况下,当结果宜人性低时,程序公正对政策可接受性有积极的影响,当结果宜人性高时,程序公正不影响政策可接受性;在低信任情况下,当结果宜人性高时,程序公正对政策可接受性有积极的影响,当结果宜人性低时,程序公正不影响政策可接受性。

H2a: 认知信任是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影响政府满意度的调节变量。在高信任情况下,当结果宜人性低时,程序公正对政府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当结果宜人性高时,程序公正不影响政府

满意度;在低信任情况下,当结果宜人性高时,程序公正对政府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当结果宜人性低时,程序公正不影响政府满意度。

H2b:情感信任是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影响政府满意度的调节变量。在高信任情况下,当结果宜人性低时,程序公正对政府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当结果宜人性高时,程序公正不影响政府满意度;在低信任情况下,当结果宜人性高时,程序公正对政府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当结果宜人性低时,程序公正不影响政府满意度。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第二部分分为3个子研究(研究2a,研究2b和研究2c)。这3个研究分别通过实验室 Scenario、实验室模拟实验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在不同的政策(户口政策、模拟社区分配政策、小汽车摇号政策)情境下,考察了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的边界作用。研究2a通过实验室 Scenario的方法,在户口政策情境下,通过操纵4个自变量程序公正、结果宜人性、认知信任、情感信任,检验假设模型。其中程序公正使用“无偏性原则”对其进行操纵;研究2b通过实验室模拟实验的方法,在实验室进一步加强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模拟。实验开始之前,被试被告知完成一项《模拟社区》网络游戏的开发实验,并引导被试相信他同时还和另外42名被试同时进行这个实验。待被试进入实验游戏开发试验开始页面时,电脑会呈现一段实验任务的说明,目的是让其知道在实验中他和不同房间的其他实验参与者通过电脑联网,共同完成一个《模拟社区》网络游戏开发实验。模拟社区的管理者由事先安排的3位参与者担任,他和同时间段参与实验的其他39名实验参与者则是该社区的居民。在实验中获得的金币最后将兑换为被试的被试费。社区管理机构管理社区的居民,拥有支配整个社区资源的权力。整个社区拥有2000个金币,每个金币兑换1元人民币。社区管理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奖金分配政策,对居民的工作结果进行评价,分配整个社区的2000个金币。居民接受社区管理机构的管理。居民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系列的工作。整个工作结束之后每位居民会得到金币作为报酬。在5轮练习任务之后,社区管理机构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后制定奖金分配政策,根据政策内容,每位居民最终能拿到多少报酬金将由这个政策决定。

模拟社区中真实的奖金分配政策制定过程,

分别操纵4个自变量程序公正、结果宜人性、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其中程序公正利用“话语权”进行操纵,检验假设模型。研究2b还加入了行为层面的分析,通过测量对政策的支持行为,进一步分析态度影响模型和行为影响模型之间的差异。为了保证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本项目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研究2c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一个真实的公共政策(小汽车摇号政策),选择某区域居民进行态度抽样调查,收集被试对程序公正、结果宜人性和权威信任(包括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的感知,然后测量被试对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的评价以及控制变量(包括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了解程度、对公共政策带来影响的了解程度、人口学等),检验假设模型。第二部分研究的统计方法与第一部分相同。

上述两部分研究层层深入:先考察未考虑权威信任(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时程序公正与结果宜人性影响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的调节模型,再关注不同权威信任(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条件下该模型是否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模式。两部分研究不存在包含关系,第二部分研究的实施也不依赖于第一部分研究的结果。

5 理论建构及创新

以往关于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对态度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而且交互作用模式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e.g., De Cremer & van Knippenberg, 2003; Lin et al., 2009)。一种是低低交互,当结果对人们不利的时候,程序公正效应更加显著;当结果对人们有利的时候,程序公正效应很小或者不存在。程序公正缓解了不利结果带来的消极影响;另一种是高高交互,当结果对人们有利的时候,程序公正效应更加显著;当结果对人们不利的时候,程序公正效应很小或者不存在。程序公正不能缓解不利结果带来的消极影响,只能进一步提升有利结果带来的积极影响。那么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如何影响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它们会呈现何种交互模式?另外,权威信任是否是其边界条件决定着不同交互模式的出现?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的边界作用是否相同?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拟在不同的公共政策情境中通过 Scenario、实验室模拟实验和问

卷调查方法, 探明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对政策可接受性、政府满意度的交互作用机制, 以及权威信任对此交互作用机制的边界效应,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对于政策可接受性、政府满意度及其因子关系的调节作用, 最终建立程序公正、结果宜人性和权威信任(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和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模型。

该理论模型见图3和图4。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但是交互模式取决于人们对政府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水平。当认知(情感)信任高时, 程序公正缓解了不利结果带来的消极影响, 面对不公正的程序和不利的结果, 人们对公共政策的接受程度最低(见图3), 即所谓的程序公正补偿性效应; 当认知(情感)信任低时, 程序公正进一步提升有利结果带来的积极影响, 面对公正的程序和有利的结果, 人们对公共政策的接受程度最高(见图4), 即所谓的反程序公正补偿性效应。

我国心理学研究多集中于探索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的问题, 很少涉足公共管理领域, 本研究的开展将涉入公共政策领域, 关注程序公正和权威信任对政策可接受性的影响机制, 同时将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纳入程序公正对政策可接受性等结果变量作用的模型, 检验并比较了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的边界作用, 具有强烈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 本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以往关于程序公正和权威信任的研究。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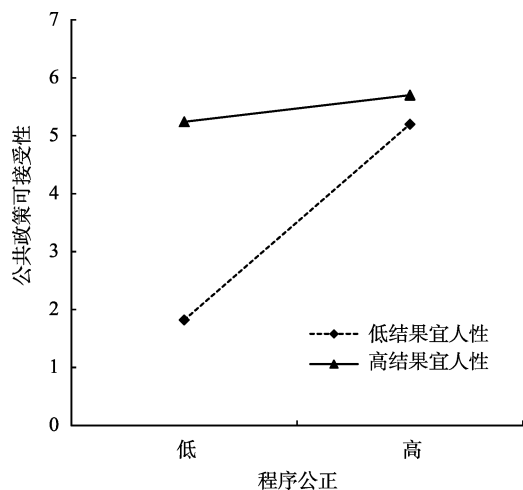


图3 当认知(情感)信任高时, 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之间的交互作用(高低交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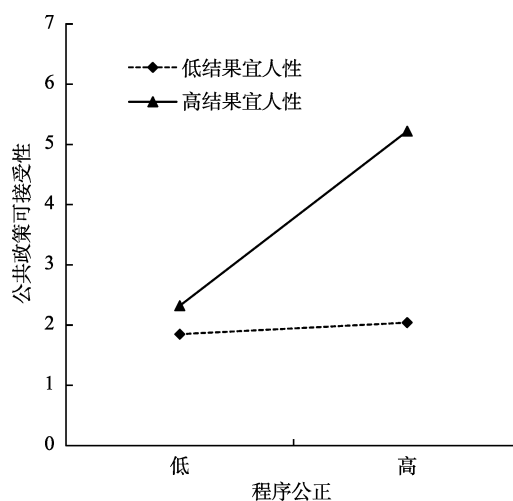


图4 认知(情感)信任低时, 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之间的交互作用(高高交互)

上, 为政府提高民众对政策的满意度和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参考文献

- 陈天柱. (2011). 论基层社会稳定机制的若干思考——对几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 *社会科学研究*, (5), 70-73.
- 胡晓敏. (2010). 政府公信力现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商业文化(学术版)*, (3), 215.
- 李大治, 王二平. (2007). 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对政策可接受性的影响. *心理学报*, 39(6), 1093-1101.
- 马浩国, 秦晓增, 杨其连. (2012).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 *法制与社会*, (3), 175-176, 181.
- 宁国良, 罗立. (2012). 公共政策公信力: 构建政府信任的重要维度. *政治学研究*, (6), 108-114.
- 单光鼎. (2010). 2009年群体性事件全解析. 南方周末. 2010-05-30 取自: <http://onghui.shmtu.edu.cn/article.aspx?d=601>
- 司马媛, 童星. (2011). 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再思考及政策适应. *学习与实践*, (12), 93-98.
- 童星. (2010). 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学习与实践*, (9), 114-119.
- 王二平. (2006). 基于公众态度调查的社会预警系统. *中国科学院院刊*, 21(2), 125-131.
- 韦春艳, 漆国生. (2010). 我国公共政策公信力问题探析. *理论导刊*, (2), 19-20.
- 许多, 张小林. (2007). 中国组织情境下的组织公民行为. *心理科学进展*, 15, 505-510.
- 于海波, 方俐洛, 凌文轻, 郑晓明. (2007). 组织信任对员工态度和离职意向、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 *心理学报*, 39(2), 311-320.
- 张玉, 唐良凤. (2012). 论规制性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历史演进为分析文

- 本. 人文杂志, (2), 145-153.
- 周柏春. (2009). 影响公共政策失效的因素及其矫正. *理论导刊*, (12), 12-14.
- 周明建, 宝贡敏. (2005). 组织中的社会交换: 由直接到间接. *心理学报*, 37, 535-541.
- 朱水成. (2008). 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问题研究概述. *理论导刊*, (2), 105-107.
- 邹谢华, 朱明. (2009). 论社会正义的多维释义及其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启示. *中国行政管理*, (12), 42-45.
- Blau, P. M.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 Brashear, T. G., Manolis, C., & Brooks, C. M. (2005). The effects of control, trust, and justice on salesperson turnover.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8(3), 241-249.
- Brockner, J., Chen, Y. R., Mannix, E. A., Leung, K., & Skarlicki, D. P. (2000). Culture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When the effects of what you do depend on how you do i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5(1), 138-159.
- Brockner, J., De Cremer, D., Fishman, A. Y., & Spiegel, S. (2008). When does high procedural fairness reduce self-evaluations following unfavorable outcom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evention focu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2), 187-200.
- Brockner, J., De Cremer, D., van den Bos, K., & Chen, Y. R. (2005). The influence of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on procedural fairness effec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6(2), 155-167.
- Brockner, J., & Siegel, P. (1996).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role of trust. In R. M. Kramer & T. R. Tyler (Eds.), *Trust in organizations: Frontie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pp. 390-413). Thousand Oaks, CA, U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Brockner, J., & Wiesenfeld, B. M. (1996).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reactions to decisions: Interactive effects of outcomes and procedur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0(2), 189-208.
- Chanley, V. A., Rudolph, T. J., & Rahn, W. M. (2000).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A time series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4(3), 239-56.
- Chen, Y. R., Brockner, J., & Greenberg, J. (2003). When is it "A pleasure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status, outcome favorability,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2, 1-21.
- Citrin, J., & Muste, C. (1999). Trust in government. In J. P. Robinson, P. R. Shaver, & L. S. Wrightsman (Eds.), *Measur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Vol. 2, pp. 465-466).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Colquitt, J. A. (2001). On the dimensionality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3), 86-400.
- Cropanzano, R., Paddock, L., Rupp, D. E., Bagger, J., & Baldwin, A. (2008). How regulatory focus impacts the process-by-outcome interaction for perceived fairness and emotio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05, 36-51.
- De Cremer, D., & van Knippenberg, D. (2003). Cooperation with leaders in social dilemmas: On the effects of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outcome favorability in struc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1, 1-11.
- De Cremer, D., & Tyler, T. R. (2007). The effects of trust in authority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on cooper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3), 639-649.
- De Cremer, D., Brockner, J., Fishman, A., van Dijke, M., van Olffen, W., & Mayer, D. M. (2010). When do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outcome fairness interact to influence employees' work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uncertain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5, 291-304.
- Dirks, K. T., & Ferrin, D. L. (2002). Trust in leadership: Meta-analytic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7, 611-628.
- Easton, D. (1965). *A systems of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 Folger, R. (1977). Distributiv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Combined impact of voice and improvement on experienced inequ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108-119.
- Goldstein, R. L., Goldstein, K., & Schorr, J. K. (1992). Trus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e case of three mile isl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13(4), 693-707.
- Hetherington, M. J. (1999).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trust on the presidential vote, 1968-96.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2), 311-326.
- Hetherington, M. J. (2005). *Why trust matters: Declining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demis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therington, M. J., & Nugent, J. D. (2001). Explaining public support for devolution: The role of political trust. In J. R. Hibbing & E. Theiss-orse (Eds.), *What is it about government that Americans dislike* (p. 1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amer, R. M. (1999). Trust and distrust in organizations: Emerging perspectives, enduring ques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0(1), 569-598.
- Kramer, R. M., & Tyler, T. R. (1996). *Trust in organizations: Frontie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wong, J. Y. Y., & Leung, K. (2002). A moderator of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outcome favorability: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87(2), 278–299.
- Leung, K., Tong, K. K., & Lind, E. A. (2007). Realpolitik versus fair process: Moderating effect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on acceptance of political decis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476–489.
- Levi, M., & Stoker, L. (2000). 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475–507.
- Lewicki, R. J., Wiethoff, C., & Tomlinson, E. C. (2005). What is the role of trust i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n J. Greenberg & J. A. Colquitt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p. 247–272). Mahwah, NJ, US: Lawrence Erlbaum.
- Lewis, J. D., & Weigert, A. (1985). 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 *Social Forces*, 63(4), 967–985.
- Lin, X. W., Che, H. S., & Leung, K. (2009). The role of leader morality in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outcome favorabilit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9, 1536–1561.
- Lind, E. A. (2001). 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 Justice judgments as pivotal cognitions in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In J. Greenberg & R. Cropanzano (Eds.), *Advances i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p. 56–88).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d, E. A., & Earley, P. C. (1992). Procedural justice and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7, 227–242.
- Lind, E. A., & Tyler, T. R. (1988).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 US: Springer.
- Luhmann, N. (2000). Familiarity, confidence, trust: Problems and alternatives. In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pp. 94–107).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 Magner, N. R., Rahman, M., & Welker, R. B. (1996).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utcome favorability and procedural justice in work resource allocation on work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6(9), 825–842.
- Mayer, R. C., Davis, J. H., & Schoorman, F. D. (1995).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3), 709–734.
- McAllister, D. J. (1995). Affect- 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 24–59.
- Patchen, M. (1983). Students' own racial attitudes and those of peers of both races, as related to interracial behaviors.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68, 59–77.
- Press, I., Burt, I., & Barling, J. (1979). Racial preferences among South African white and black pre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07, 125–126.
- Rolland, F., & Steiner, D. D. (2007). Test-taker reactions to the selection process: Effects of outcome favorability, explanations, and voice on fairness percep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7(12), 2800–2826.
- Rousseau, D. M., Sitkin, S. B., Burt, R. S., & Camerer, C. (1998). 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 Across discipline view of tr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 393–404.
- Rudolph, T. J., & Evans, J. (2005). Political trust, ideology, and public support for government spen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3), 660–671.
- Scholz, J. T., & Lubell, M. (1998). Trust and taxpaying: Testing the heuristic approach to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2), 398–417.
- Sherif, M., & Hovland, C. I. (1961). *Social judgment: Assimilation and contrast effects in communication and attitude chan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gelman, L., Sigelman, C. K., & Walkosz, B. J. (1992). The public and the paradox of leadership: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2), 366–85.
- Staples, S. L. (1997). Public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noise: Modeling exposure or understanding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7, 2063–2067.
- Thibault, J., & Walker, L. (1975).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Hillsid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Tyler, T. R., Boeckmann, R. J., Smith, H. J., & Huo, Y. J. (1997). *Social justice in a diverse socie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Tyler, T. R., & DeGoe, P. (1995). Collective restraint in social dilemmas: Procedural justice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effects on support for authorit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482–497.
- Ulbig, S. G. (2008). Voice is not enough: The importance of influence in political trust and policy assessm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2(3), 523–539.
- van Dijke, M., & Verboon, P. (2010). Trust in authorities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to procedural fairness effects on tax compli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1(1), 80–91.
- Wu, X. N., & Wang, E. P. (2013). Outcome favorability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to voice effect on people's reactions to public policymaking.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 329–337.
- Wu, X. N., Wang, E. P., Xu, H., & Zhou, J. S. (2009). *Post-isaster risk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cceptance of earthquake survivors in China*. IEEE: The proceeding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p. 1269–1273), Beijing, China.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rust in authority: A mechanism for acceptance of public policy

WU Xuanna

(Beijing Key Lab of Learning and Cognitio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risk is increasing. One important characterization is that group events frequently occur. It hints that people do not accept public policy. If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y does not fully consider public acceptability, it is likely to constitute a new social risk, threatening social stability. Therefore,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public acceptance of public policy has become a major problem that should be solved in our country.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acceptance of public policy and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with the impact of procedural justice, outcome favorability and trust in authority (cognitive trust and affective trust) and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cceptance of the policy. Through scenario, experiment, and cross-sectional survey, this study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 and outcome favorability on acceptance of public policy and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and the boundary effect of trust in authority on this mechanism, on the basis of which to further analyze the moderation of cognitive trust and affective trus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eptance of policy,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and their factors.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to improve public satisfaction with the policy,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government policy.

Key words: procedural justice; trust in authority; cognitive trust; affective trust; acceptance of public policy